

缅甸的民族性格及对缅内外政策影响^[1]

宁 威

【内容提要】自独立以来，缅甸政局跌宕起伏，民族冲突绵延至今，经济民生长期凋敝，致使国家发展落后。学界对缅甸问题极为关注，并尝试从“军政府合法性”“民主化进程”“族群冲突”等维度解构当代缅甸问题，但对缅甸的“民族性格”这一关键要素则明显关注不足。缅甸的民族性格总体呈现“温和乐善”“刚强尚武”“敏感谨慎”三重特质，从独立后缅甸的政治、经济历史发展来看，缅甸的民族性格对其民族国家建构、国家治理体制确立及对外交往原则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缅甸民族性格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缅甸问题的影响进行剖析，有助于从民族心理层面更加深入地透视当前缅甸问题的深层矛盾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缅甸 民族性格 国家建构 民族矛盾 中立外交

【作者简介】宁威，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信息工程大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5-0158-21

[1]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缅甸政局突变后中缅民心相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BGJ068)、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缅甸政局突变对中缅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ZZD00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缅甸自 1948 年独立以来，军方多次接管国家权力，民主化进程频遭挫折，国家长期深陷政治分裂、经济衰退、内战频发、外交孤立的多重困境。国内外学者对缅甸问题极为关注，多从“军政权合法性”“民主化进程”“族群冲突”等维度对缅甸问题进行分析，而对影响其政局的深层次因素——“民族性格”则关注不足，这使当前的缅甸问题研究存在一定缺失。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民族性格对于一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起着持久、决定性影响，国际政治观察家必须将民族性格考虑在内”。^[1]不同民族所展现出的独特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国家在政治体制建构、国家结构规划，以及内政和外交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选择与决策。^[2]缅甸独立以来的政治变迁，无不折射出其民族性格的显著特点。因此，本文将对缅甸民族性格的特点进行全面梳理归纳，从宗教、地理、历史、文化等关键因素上剖析其成因，揭示其对缅甸民族国家建构、民族整合、政局稳定及外交决策的作用与影响。

一、缅甸民族性格相关研究

（一）民族性格对民族国家建构及其国家行为的影响

“民族性格”是同一民族所属的个体成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心理特点、性格特征、价值取向、行为表现以及对事物的看法态度等总和^[3]，习惯上称之为“国民性格”，其在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起着“方向盘”的作用。^[4]不少学者早已开始关注“民族性格”对民族国家建构

[1] [德]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2 页。

[2] Ernest Barker,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Factors in Its Formation*, Morrison & Gibb Ltd, 1927, p.4.

[3]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4] 杨雷：《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元结构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载《东疆学刊》2008 年第 1 期，第 56 页。

的重要作用。例如，黑格尔认为，“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是民族大家庭的灵魂，而国家政治组织则是其躯体”。^[1]随着二战后世界各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民族性格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显著，逐步引发学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民族性格对国家建构和外交行为的影响。美国战略情报家华盛顿·普拉特（Washington Platt）表示：“过分强调国际关系中的规律性，而忽略民族性格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将导致对局势的误判。”^[2]

（二）缅甸民族性格及其对国内局势影响

作为一个集合了共性与个性的概念，民族性格是由个体成员的性格抽象归纳得出的“整体性格”，体现了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在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验下形成的性格结构核心。缅族是缅甸的主体民族，在国内政治、经济领域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认为，缅甸的“民族性格”是以主体民族缅族为代表的缅甸民族的“整体性格”，是缅甸民族性格中的最大公约数。截至目前，国内外对缅甸民族性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缅甸民族性格的特点。殖民时期的葡萄牙和美国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对缅甸的民族性格作过初步描述，认为缅甸人“彬彬有礼”“温和善良”，但也不乏“狡诈”。^[3]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也认为缅甸民族性格具有“既温和虔诚，又狡猾暴力”的两面性。^[4]这些分析都揭示了缅甸民族性格的复杂与多元。二是形成缅甸民族性格的影响因素。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Thant Myint-U）认为，“英国殖民文化遗产对塑造缅甸民族性格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5]美国人类学家麦尔福·史拜罗（Melford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70页。

[2] Washington Platt, *Strategic Intelligence Production—Basic Principles*, Praeger, 1957, p.118.

[3] Anne Judson, *Memoir of Ann H. Judson, Missionary to Burma*, Titus Books, December 25, 2013, p.82.

[4]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Burmese Politic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9, p.16.

[5] Thant Myint-U, *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1, p.79.

E. Spiro) 通过研究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盛行时期缅甸社会的变迁,揭示了其在缅甸民族品德、社会价值观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1]三是缅甸民族性格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例如,缅甸学者钦佐温(Khin Zaw Win)从缅甸民族性格的角度探讨了“大缅甸主义”盛行的原因^[2];也有学者从民族性格视角诠释了缅甸传统中的反民主倾向。^[3]

这些对缅甸民族性格的分析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有尚待深入挖掘的空间。一是对缅甸民族性格的刻画深度和认知仍不够系统,二是对影响缅甸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分析不足,三是对民族性格如何影响缅甸内政外交的探讨不够深入。本文尝试进一步推进对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理解当代缅甸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缅甸民族性格的“三重性”

曾长期从事跨文化交流的美国前外交官耶鲁·瑞奇蒙(Yale Richmond)认为,“界定民族性格是一项艰巨且风险性极高的任务”。^[4]民族性格是根植于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特质,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非显性等特点,其真实内涵往往超越了外在表现,使得对其深入理解和精确描述极具挑战。然而,民族性格作为民族共同体自形成以来所共有的观念,根植于深层意识之中,具有稳定性,这为研究特定民族的性格提供了可能。基于笔者长期从事缅甸语教学和缅甸问题研究,以及在缅甸生活、学习和工作期间所做的深度田野调查等经验和资料,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究缅甸民族性格的主要特质。

[1] Melford E. Spiro, *Anthropological Other or Burmese Brother?* Routledge, 1992, p.186.

[2] [缅] 钦佐温:《佛教与民族主义——缅甸如何走出民族主义的泥潭》,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24页。

[3] Michael Gravers, *Nationalism as Political Paranoia in Burma: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Power*, Curzon, 1999, p.43.

[4] [美] 耶鲁·瑞奇蒙德:《解读俄罗斯人》,郭武文、姚华侨等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第一重特质——温和乐善

缅甸民族自我标榜为“世界上最温和的民族之一”。^[1] 缅甸民族把谦和有礼、积德行善、克己忍耐视为人生追求，成为最为显性的性格特征。

一是谦和有礼。人们在与缅甸人初次接触时，他们往往表现出亲和友好的态度。英国驻缅甸的前殖民政府官员菲尔丁-霍尔（Harold Fielding-Hall）形容缅甸人“和蔼可亲”“开朗热情”。^[2] 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他们也主要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从语言学视角来看，缅语发音总体上比较轻柔，缅语中的否定词总是放在最后，表达不满的方式尤其委婉，甚少直接表示否定意见。缅甸人非常注重礼仪，在社交场合，遇到佛、法、僧、父母、师长等尊崇对象时，通常会行合十礼表达敬意，在特殊节日的庆典中更是行“跪拜”大礼以示尊重。这不仅体现了缅甸民族对文化传统的重视，也反映出其民族性格中“谦和有礼”的一面。

二是积德行善。乐善好施是缅甸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缅甸的启蒙读物《佛本生经》强调积德行善对于获取幸福的重要性，其中《维丹达亚本生》中的维丹达亚王子自小乐善好施，屡遭挫折却因其善心而化险为夷、最终升天^[3]，被民众视为乐善好施的典范。^[4] 在传统节日中，缅甸民众更是自发地向僧侣进行布施。古代国王和历任国家领导人也一直遵循传统，在重要节日甚至亲临寺庙，向高僧跪赠袈裟等以积累功德，争取僧侣和佛教徒的支持。

三是克己忍耐。缅甸民族将不幸视为前世的因果报应，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冷静隐忍，自律克己的韧性已沉淀于文化之中。他们推崇能够战胜私欲、乐于奉献的“非凡”之人，将其奉为道德典范。^[5] 《佛本生经》刻画

[1] 苏自勤、刘利民编著：《我们的民族》，载《缅甸语阅读教材（第一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2] Harold Fielding Hall, *A people at school*,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June 25, 2009, p.22.

[3] [缅] 吴奥巴达、吴彬尼亚德卡、吴南达梅达：《十大佛本生故事汇编》，仰光：班瑞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4] [缅] 吴金莱：《〈本生经〉中的成语》，载《缅甸文学研究论文集》，仰光：班瑞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5] 钟智翔：《试论小乘佛教对缅甸文化的核心作用》，载《东南亚纵横》1997年第2期，第54页。

了乔达摩·悉达多王子为追求“成佛”这一伟大目标，舍弃宫中优渥生活、抛弃世间一切而投身修行的故事，其克己修身的精神，进一步强化了缅甸民族对于“自律”“奉献”和“忍耐”的价值认同。

第二重特质——刚强尚武

缅甸经历了蒲甘、东吁和贡榜等王朝的兴衰更迭。在近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下，缅甸人民历经了无数战火的洗礼，但始终不屈不挠。其民族性格中既有“英勇尚武”的果敢，也有“坚忍不拔”的韧性。

缅甸人曾以英勇尚武而闻名于东南亚。国名“缅甸”在缅语中象征着机敏与强壮，缅甸2010年最新确定的国旗以黄、绿、红三色为主，红色代表着勇敢与果决。11世纪至18世纪期间，缅甸三大帝王阿奴律陀、莽应龙、雍籍牙先后完成了历史上三次大统一，通过战争多次征服暹罗（今泰国）、若开等地，成为缅甸人崇拜的民族英雄。在缅甸各王朝时期的地图中，印度东北部、泰国大部、马来半岛与柬埔寨等地都曾纳入其势力范围。缅甸著名诗人那信囊在《出征》一诗中，将军人的英勇与自然界中强大威武的形象相类比，以此彰显军人在战场上的英勇精神，形象地刻画出东吁王朝时期缅甸军人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投身战场的决心和勇气。^[1] 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对此直言不讳：“尽管缅甸的领土规模相对较小，但其在历史上所展现出的扩张性与帝国性不容忽视。”^[2]

缅甸人具有拒绝臣服他国的坚忍不拔精神。自1885年英国攻占缅甸后，缅甸民众从未屈服于殖民统治，他们搁置内部矛盾，多次组织起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誓死捍卫国家的独立自由。其中最著名的当数1930—1932年僧人“塞耶山”率领的起义，尽管面临装备和训练上的劣势，但他们利用熟谙地形的优势，坚持对英军展开“游击战”，极大地震撼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英国军官曾评价“缅甸人的宗教信仰和性格使他们不会自感卑

[1] 姚秉彦、李谋、蔡祝生：《缅甸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2]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Farrar Straus & Giroux, December 12, 2006, p.17.

微”。^[1]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后，并未信守承诺给予缅甸独立，而是在缅甸实行法西斯统治。1944年8月，昂山将军等民族领袖领导成立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带领民众进行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在日本侵略者被驱逐出缅甸的过程中，英国军队作为盟军进入缅甸，企图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缅甸人民不愿屈服，经过反复斗争，最终于1948年1月赢得独立。此后缅甸更是主动退出英联邦，并通过修改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等方式，积极消除殖民印迹。^[2]如1989年将国名由“Burma”改为“Myanmar”，把当时的首都仰光“Rangoon”更名为“Yangon”，向外界展示了缅甸维护国家独立、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

第三重特质——敏感谨慎

频繁的外敌入侵和不断激化的国内民族矛盾使缅甸政局长期动荡，缅甸民族内心深处对“分离主义”和“外部干涉”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敏感谨慎的性格特质对于缅甸政治稳定发展影响深远，是理解其政治现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缅甸民族认为冲突战乱是世界的常态，而和平则是短暂的安宁。据缅甸历史巨著《琉璃宫史》记载，缅甸历代国王对国家分裂的担忧始终如影随形。^[3]尽管封建王朝时期的缅甸国王或1948年独立后的政治精英都试图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但大都事与愿违，各民族之间始终缺乏统一的国家观念。历史上，每当中央王朝权力式微，少数民族便抓住机会积极寻求自治，加剧了国家的政治分裂。该现象导致缅甸各民族之间长期相互猜疑，争斗不断。缅族统治阶层对少数民族的潜在反抗持续保持警惕，而少数民族则对缅族的统治感到忧虑，担心自己遭受压迫和欺凌。互不信任逐

[1]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Farrar Straus & Giroux, December 12, 2006, p.26.

[2] Thant Myint-U,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eptember 1, 2011, p.24.

[3] [緬]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编：《琉璃宫史》（上卷），李谋、姚秉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97页。

渐内化为缅甸民族“敏感戒备”的性格，族际关系也陷入周而复始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作为中小国家，缅甸对外部干涉尤为担忧，这也体现在民族性格中。从封建王朝至今，由于与邻国——中国、印度实力悬殊，缅甸常因自身与两国的结构性差异而倍感焦虑，其谚语“羊不能够承受大象的挑衅”便是该心理的生动写照。此外，在《琉璃宫史》关于中国的“叙事”中，对“中缅战争”的记述占了近四成，从侧面反映了缅甸对陆上强邻的忧虑。同时，缅甸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亦抱有高度警惕。公元1635年，缅甸东吁王朝国王他隆为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海上贸易纷争，不惜将都城从繁荣的下缅甸勃固迁至相对闭塞的中部阿瓦。^[1]19世纪的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进一步加深了缅甸民族对外部势力的恐惧感，因此缅甸敏同王训诫后人要从《琉璃宫史》中汲取历史教训，注意防范外敌入侵。^[2]缅甸独立后，领土完整得到保障，但缅甸实际上尚未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即中央政权从未完全实现过对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国内政治呈现出多元碎片化特点，在面对外部渗透时尤为脆弱。^[3]因此，缅甸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展现出一种审慎戒备的态度。

三、缅甸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缅甸民族性格发源于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历史脉络以及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璀璨的历史文化给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4]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多种文化相继传入缅甸，使其民族性格不断丰富升华，最终形成当前复杂多元的特质。

[1] [緬] 貌丁昂：《緬甸史》，賀聖達譯，昆明：雲南省東南亞研究所編印1983年版，第127頁。

[2] 同上，第215頁。

[3] [美] 普里希拉·A·克拉普：《美國緬甸政策的調整方向》，載《南洋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第82頁。

[4] 朱明忠：《宗教與印度的民族性格》，載《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第28頁。

（一）佛教信仰对缅甸民族性格形成的深层影响

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与发展，佛教成为缅甸民族价值观念、伦理判断的核心依据，对缅甸的风俗习惯、文学创作、艺术风格等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缅甸民族性格。

佛教功德思想赋予缅甸民族乐善克己的性格底色。佛教的伦理功能在缅甸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佛教教义通过一系列规范性实践（包括戒律、禁忌、经文以及布道）得以传播，在社会行为规范和关系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因果业报是佛教文化的精髓，强调个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积累功德被视为获得幸福的必要途径，持戒修身被视为神圣的义务。佛教主张正直诚信、温和乐善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对缅甸民族的行为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

维护佛教教义激发了缅甸人民刚强坚贞的民族精神。宗教冲突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种角度的解读：以“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为代表的原生主义者认为，宗教差异常常引发民族分裂甚至国家之间的冲突^[2]；工具主义者则认为宗教冲突是政客操控宗教政治化的结果；温和建构主义者则将宗教视为中介变量，其对暴力的促进或抑制取决于暴力的合法化解读是否占据主导。^[3]在缅甸社会中，由上述原因导致的宗教冲突并不鲜见，佛教不仅是缅甸民族精神的黏合剂，也是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保卫佛教成为凝聚人心的最有效途径。在古代，缅甸国王通过推广佛教巩固政权，将佛教政治化，以解释其对外扩张的合法性，宣称“为推广佛法而战是正义之战，未来将获得更多福报”。^[4]反殖民统治时期，佛教是激发爱国主义的重要精神承载，“佛教青年会”等佛教

[1] 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 [意]F.佩蒂多、[英]P.哈兹波罗：《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张新樟、奚颖瑞、吴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4] [緬]吴巴乌：《缅甸统治学》，仰光：彬泽甘书局2011年版，第356页。

团体成为领导反帝独立斗争的重要力量^[1]，佛教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强化了缅甸民族性格的“刚强”内核。

对宗教分裂的隐忧加剧了缅甸民族敏感谨慎的心理。宗教通常要求信徒忠于其教义，使宗教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不少信徒坚信自己的信仰是优越的，异教徒应该受到压制。多元主义则要求坚持承认真理的多样性，信徒的宗教身份具有偶然性和可变性，宗教排他性与多元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缅甸这种情况尤为明显。11世纪初，缅甸国王阿奴律陀为统一蒲甘地区的宗教信仰，大力推行佛教，以取代“阿利僧派”等“异端宗教”。英国殖民时期，统治者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基督教，试图瓦解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本就基础薄弱的文化认同。缅甸佛教徒普遍认为，“基督教不仅改变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还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将其与英国殖民者深度绑定，使殖民者更易挑唆民族分裂”。^[2]在此背景下，缅族精英对少数民族的非佛教行为高度敏感，将其视为“制造民族分裂”。少数民族则将缅族对佛教的尊崇视为“大缅族主义”，彼此之间的戒备心理进一步催生了“多元主义恐惧”。

（二）地缘环境对缅甸民族性格形成的整体塑造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文化取向、交际行为及其社会规范”。^[3]有着“围堵政策教父”之称的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进一步指出：“一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大小、地形以及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最重要因素。”^[4]缅甸独特的地缘环境也很大程度地影响着缅甸民族性格的形成。

一是缅甸作为“亚洲的十字路口”的复杂环境造就了缅甸民族的敏感谨慎。一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国的地缘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

[1] 李晨阳：《佛教与缅甸的反帝独立斗争》，载《东南亚纵横》1994年第2期，第17页。

[2] Mikael Gravers, *Nationalism as Political Paranoia in Burma: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Power*, Curzon, 1999, p.17.

[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12月版，第137页。

[4]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33页。

其发展潜力与政策选择空间。首先，缅甸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于其同时毗邻中印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使缅甸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核心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各大国的关注。^[1]其次，缅甸作为“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连接点、海权与陆权交汇之处，不仅是东南亚与南亚之间的陆路交通枢纽，也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桥梁。^[2]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将缅甸划归为“处于围绕着大陆心脏地带的内新月区”，而斯皮克曼则将缅甸视为“进入心脏地带的门户”。^[3]二战期间，缅甸既是日本觊觎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地区的战略跳板，也是英美防守印度、支援中国抗日的关键枢纽。然而，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赋予缅甸重要价值的同时，也令其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难以摆脱大国博弈的影响，更易产生不安全感。

二是高山平原相间的割裂地形客观上制约着缅甸民族认同的形成。领土形状与地理结构对于国家治理的统一性、经济发展、文化整合以及社会进步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4]缅甸三面环山，地形北高南低，伊洛瓦底江将国家一分为二。高山大川纵横交错的自然布局，将缅甸天然划分为多个不同地域单元。^[5]地理的分隔不仅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交通联系，更在客观上阻碍了他们的交往融合。古代缅甸国王主要控制着缅族聚居的伊洛瓦底江河谷地区，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则大多由当地土司掌控。地理与政治的双重割裂，导致缅甸各民族未能充分融合。英国殖民缅甸期间，对缅族聚居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而对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则以保留土司制度的方式进行间接控制，“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加剧了缅族与其他少数民族

[1] Thant Myint-U,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eptember 1, 2011, p.65.

[2] 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3] [法]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38页。

[4] 韦氏：《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267页。

[5] [緬]吴巴丹：《緬甸地理》，仰光：耶印文学1963年版，第41页。

之间的隔阂。缅甸独立后，严重的民族矛盾使部分少数民族成立地方武装组织与中央政府对抗，这些组织依托山区易守难攻的地形长期与缅军周旋，割裂的局面延续至今，加剧了民族认同的分裂。

三是热带丰富的自然资源赋予缅甸民族温和的特性。丰富的热带自然资源不仅决定了缅甸的经济类型，更在某种程度上悄然塑造着缅甸民族的性格特质。中国古籍早已指出了自然资源对缅甸民族性格的影响。据《西南夷风土记》记载，“（缅甸）四时如春夏，土地肥饶，米谷木棉皆贱，故夷中无饥寒告乏者，夫夷人之性，不甚凶残，无大奸诡”。^[1]终年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带来充足的农业和林业资源，缅甸素有“稻米之国”的美誉。丰富的矿产和水产资源也为缅甸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为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使他们无需过分担忧生计，孕育出性格中乐观温和的一面。

（三）历史叙事对缅甸民族性格的动态牵引

缅甸的民族性格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与其历史进程息息相关。^[2]从公元1世纪在伊洛瓦底河谷建立太公古国到11世纪蒲甘王朝统一缅甸，从16—18世纪称霸中南半岛到19世纪沦为英国的殖民地^[3]，缅甸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强化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统一王朝的辉煌历史塑造了缅甸民族勇敢无畏的民族自信，也给予了他们浓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公元1044年蒲甘王阿奴律陀继位后，大面积推广水稻种植，在高超水利技术的推动下，缅甸逐渐成为中南半岛最富庶的国家。迨至第二个统一王朝东吁时期，缅甸对外已展现出强大的征服能力。据史料记载，“（东吁王朝）除缅甸外，还控制了暹罗、清迈、曼尼坡等周边邦国，孟加拉、若开则献上贡品，（与东吁）结成盟友”。西方史学家因此将该时期的东吁王朝称为“第一东吁帝国”。^[4]据《瑞喜宫佛塔升宝伞碑文》和《王储碑》记载，在第三个统一王朝贡榜时期，东部東

[1] 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南昌：广文书局2005年版，第10页。

[2] 谢冬慧：《从民族性格看美国的法制创新》，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第11页。

[3] 王介南、王全珍：《缅甸》，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贺圣达：《缅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埔寨部分地区、阿萨姆地区以及整个若开地区均在缅甸控制之下。^[1] 缅甸民族在对暹罗的战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在中南半岛上建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辽阔帝国。在征服他国的过程中，缅甸民族自信心不断上升，形成了刚强自信的性格特点。

另一方面，外敌入侵的悲情历史又锻造出缅甸人民独立不屈的民族意志。在众多增强国内团结的因素中，共同面对国家之间的战争，常常是凝聚民族精神的有力催化剂，能够促进民族性格的统一和强化。19世纪末，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缅甸各民族的反抗意识逐渐觉醒，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进行英勇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屡遭残酷镇压，但革命的激情却锻造了缅甸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缅甸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了初步的“政治共同体”观念，不屈不挠的精神融入民族性格之中，催生了一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诗人和革命家。

（四）多元文化对缅甸民族性格的冲击形塑

文化是民族成员深层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积累，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标志。缅甸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在实践中反复固化、内化为共同体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衡量，塑造着缅甸民族性格。^[2]

一是游牧文化造就了缅甸民族尚武的精神底蕴。英国考古学家卢斯（Gordon H. Luce）等学者认为“缅甸的先民起源于中国西北羌族”。^[3] 9世纪中叶，先缅人南下通过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地带出现在缅甸中部叫栖地区。^[4]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缅甸骠国遗址具有氏羌文化的印记，进一步

[1] [緬] 緬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中央委员会总部编：《緬甸基础政治史》（第二卷，第1册），仰光印刷及书籍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02页。

[2] 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29页。

[3] 参见 Gordon H. Luce, *Old Burma—Early Pagán*, J.J. Augustin Publishers, 1970, p.24. 该观点得到包括吴佩貌丁、鸣乃、吴巴信、李谋、钟智翔等中外学者的广泛认可，并被《大英百科全书》和《缅甸百科全书》等权威出版物采纳。

[4] [英]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6页。

支持了缅甸民族与羌族的渊源关系。^[1]蒲甘时期, 缅族表现出游牧民族的诸多特点, 如饮用牛奶、擅长骑射等, 这些特点在宋代《诸蕃志》等历史典籍中得到了印证。缅甸民族深受游牧文化传统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根植于血脉的尚武精神。历史上的缅甸君主们多以勇猛善战和积极扩张领土而闻名, 英勇无畏的品质在缅甸民族的世代传承中得以延续。

二是农耕文化赋予缅甸民族温和的气质风度。自9世纪起, 缅族从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民族, 经济文化的转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更悄然地改变着民族性格。^[2]与游牧文化所强调的流动性、扩张性相比, 农耕文化更加注重稳定性、和平性, 与自然和谐共生。农耕文化所带来的稳定外部环境使缅甸民族逐渐放弃冒险和迁徙的生活方式, 转而追求安全和稳定。^[3]农耕文化自给自足和相对闭塞的特点, 使缅甸民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 格外注重安全稳定, 对冒险变革持审慎态度。美国政治学家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对缅甸南部农民生产行为进行观察后认为, “缅甸农民生性谨慎, 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谋取利益”。^[4]

三是多元文化在缅甸汇聚碰撞导致缅甸民族的不安与迷思。作为亚洲的十字路口, 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长期在缅甸碰撞交融, 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始终是缅甸民族一大考量。缅甸历史学家貌廷昂曾骄傲地表示, “缅甸虽受到具有不同文化的大国包围, 但它在近2000年来一直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5]显然, 貌廷昂既强调了缅甸文化的独特性, 也委婉地表达了缅甸民族对自身文化被多种文化包围的隐忧。在古代, 佛教经由印度传入缅甸, 印度佛教关于阶层秩序观念和行政法典的政治理想, 对古代缅甸国王

[1] 钟智翔:《缅甸民族源流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初探》, 载《东南亚》1998年第3期, 第48页。

[2] 钟智翔、尹湘玲:《缅甸文化概论》,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 第21页。

[3] 俞炜华、黄孚、马传凯:《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 载《南大商学评论》2014年第4期, 第75页。

[4]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5.

[5] [编] 貌丁昂:《缅甸史》, 贺圣达译, 昆明: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编印1983年版, 第127页。

的统治发挥了重要影响。^[1]在殖民时期，西方文化的入侵抑制了缅甸本土文化的发展，文化自觉意识及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欲成为缅甸民族追求独立的重要驱动力。^[2]殖民统治终结后，多元文化的影响促使缅甸部分民众对现行价值体系产生了质疑，社会中充斥着各种“迷思”。一方面，一些民众自豪地将缅甸传统文化视为民族发展的宝贵动力；另一方面，部分年轻人开始崇尚西方文明，思想差异已经扩散至社会各个层面。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共同认知，是当代缅甸民族所面临的一个迫切挑战。

四、民族性格对缅甸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

当代缅甸问题的形成及延续，与该国的政治道路、经济发展、外交环境、地缘格局及国际形势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国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集体行为，而非单一的理性行为体行为，因此要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就必须研究组成国家的人群的集体行为。民族性格作为民族心理中最稳定的核心要素，影响着领导人、政党乃至民众的认知、取向和立场。虽然民族性格并非是影响缅甸内政外交政策的绝对因素，但因其不可或缺性，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应被忽视。

（一）三重民族性格对缅甸内政的影响

独立后的缅甸内部矛盾重重、缺乏向心力，亟需通过“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形成统一有序的“整体”。在此过程中，民族性格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缅甸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一是“三重”民族性格对缅甸政治体制选择的影响。缅甸的建国之路经历三次立宪，反复尝试西式民主与缅式社会主义制度。宪法是国家结构形式的集中体现，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制

[1] 蒋满元：《东南亚政治与文化》，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2] [法]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

宪理念折射出该国多元行为体奉行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1]民族性格是影响政治精英价值理念、行为准则的重要因素，宪法也是一个民族性格特征的直接映射。^[2]因独立之初，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历史积怨较深的客观基础决定了联邦制更加有利于团结缅甸各民族共同走向独立，加之“温和”民族性格特质影响，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甸精英在建国初期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联邦制国家，旨在尊重并维护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多样性与自治权，这一理念在1947年颁布的《缅甸联邦宪法》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独立后，尽管宪法强调民族平等，但吴努政府在具体政策执行上却采取了诸如将佛教定为国教等同化政策，引起了非佛教徒的严重不满，使本就复杂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了一起。随着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缅甸民族性格中“刚强”的一面被激发，以奈温领导的军方为代表的缅族精英企图以强硬方式建构“单一制”国家。1974年颁布的《缅甸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采用一党制，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是国家唯一政党，并领导国家。”^[3]宪法还废除了两院制改行人民议会，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激起了缅甸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进入新世纪以来，缅甸的民主化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尤其是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将缅甸定为“暴政前哨”，并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两国政权，缅甸军政府受到震动，开始渐进地推动民主化进程，以确保自身安全，并启动了新宪法的制定。但在制定2008年宪法时，军方并不愿完全放弃权利，加之国内各方的利益需求多元复杂，“敏感谨慎”的民族性格使军政府谋求权利的相互制衡，既重视军政关系彼此制约，又强调中央与地方力量相互制衡，处处体现了军方在缅甸建立有

[1] 赵银亮、胡小诺：《比较视域下立宪主义与地区一体化相关性研究——基于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的考察》，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36页。

[2] 张文灿：《民族问题与国家结构形式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43页。

[3] The 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Burma*,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Rangoon, January 1974.

“纪律的民主”治国理念。^[1]

二是“三重”民族性格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缅甸独立后，民族问题依旧十分突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高于对缅甸国家认同，国家内部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如何尽快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将国民对各自族体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尤为重要。^[2]

在缅甸民族整合过程中，除备受关注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外，民族性格对缅甸政治精英（主要由缅族组成）选择整合方式的偏好取向亦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民族性格中“温和”的一面使缅甸精英在独立之初选择以构建“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为目标进行整合，国家内部各族群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身份、享有特殊的政策待遇，通过联邦制安排协调民族之间关系。1947年2月，缅甸主要民族代表签署了著名的《彬龙协议》，原则上同意山区少数民族在内政管理上完全自治，1947年宪法保留了除克钦邦之外的各邦分离权。另一方面，民族性格中“刚强”“敏感”的一面使缅甸精英在民族整合策略中逐步走向单一制，转向强化公民意识和公民权，以构建“多族群的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为目标，引导国内各种少数群体形成“国族”，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频频受挫。严重的民族矛盾使民族问题上升为缅甸最主要问题，加之主观上“敏感”的民族性格影响，族群关系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对分裂的恐惧促使执政者更加强调“共同身份认同”，大缅族主义和佛教极端主义频频抬头。缅甸政治精英认为只有统一的文化能够消除分裂的根源，奈温政府曾试图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缅语教育，收归报纸、私立学校等多种方式统一各民族思想。^[3] 2021年缅甸军方再次接管权力并未得到全社会认可，缅政府军与民族地方

[1] 马燕冰：《缅甸政治改革的进展与问题》，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1期，第72页。

[2] 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83页。

[3] 林之豪：《缅甸奈温时期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研究》，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1期，第98页。

武装的冲突不减反增，中央与地方的核心矛盾“分权”问题难以解决。如何整合多种不同背景的族群，建构多元主义的政治意识与文化观念，是缅甸民主转型过程中各主体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

（二）三重民族性格对缅甸外交的影响

自缅甸独立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独立自主的“中立主义”外交原则，而其外交实践却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民族性格的影响。

一是民族性格对缅甸外交原则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施奈德（Richard Snyder）指出，外交决策就是“从多种受社会限定的不确定选项中，由决策者挑选其中一种他认为能够实现其所构想的特定状况的过程”。^[1]民族性格正是了解缅甸精英决策心理的重要途径，支配着领导人、政党乃至大多数民族的行为，赋予决策过程以意义，制约着政策选择。^[2]

在国内外环境作用及缅甸民族温和有礼性格的影响下，缅甸确立了追求和平友好的外交基调。1947年宪法表示将“致力于在国际道义基础上实现国家间和平与友好合作”；1948年缅甸独立后，其时任领导人吴努强调“缅甸将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努力追求世界和平”。^[3]1954年，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和平友好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2年，奈温上台后多次强调“坚持缅甸和世界利益两者兼顾的积极中立主义政策，继续同所有国家保持现有真诚关系”。^[4]2016年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执政后，其领导人昂山素季多次公开强调“中国是缅甸搬不走的重要邻居，希望两国保持良好关

[1] Richard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on Sap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p.57.

[2] [緬] 黄美荣：《民族性对缅甸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研究》，云南大学留学生硕士学位论文论文，2020年6月。

[3] Frank N. Trager, “Burma’s Foreign Policy 1948—56 : Neutralism, Third Force And Ri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6, no.1, 1956, p.89.

[4] [緬] 貌貌季：《1962年以来的缅甸外交政策——为维护集团生存的消极中立主义》，林锡星译，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第79页。

系”。^[1]2021年,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接管政权后,提出“缅甸将奉行独立、积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所有国家交往”。^[2]

二是民族性格对缅甸外交实践的影响。敏感谨慎的民族性格使缅甸领导人十分担忧国家和政权安全,认为缅甸是“置身于仙人掌当中的嫩葫芦”,从而寻求各势力相互制衡的外交目标。^[3]2023年8月,敏昂莱在谈论缅甸局势时表示,“部分国家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干预缅甸内政,通过策划各种阴谋控制缅甸以扩大地区影响力,挑起局部战争”。^[4]经济上,缅甸精英对外来投资保持高度警惕,对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资源领域禁止对外资开放,表现出明显的“资源民族主义”倾向,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发展速度,导致缅甸成为全球通电率最低国家之一。^[5]文化上则体现为保守主义,对外来文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1962年,缅甸出台了《印刷和出版业者登记法》,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2012年,缅甸当局宣布停止新闻预先审查机制,短暂放松对媒体的审查。随着西方媒体大举进入,缅甸精英再度担忧本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侵蚀,于2021年重新加大对媒体、互联网审查力度。^[6]出于对大国的警惕和不信任,在外交实践中,缅甸精英倾向于引入各方势力相互对冲,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缅甸独立后,面对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保持自身独立性,分别与英、美、苏、中各方保持友好。近些年来,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和美西方渗透的加强,缅甸也一度主动引入域外势力以平衡周边大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并表示缅甸开启民主改革的动力之一就是

[1] 庄北宁:《昂山素季访华传递哪些信号》,新华网,2016年8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8/16/c_1119402073.htm。

[2]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大将召开会议就国管委五项方针等各项事宜作指示》,载《缅甸新光报》2023年2月10日, <https://www.gnlm.com.mm>。

[3] 许清章:《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4] 《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在2023年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开幕视频致辞》,2023年8月15日, <http://www.myawady.net.mm>。

[5] 罗圣荣、徐秀良:《缅甸的外资政策改革及其效果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16年第6期,第111页。

[6] [緬] 緬甸宣傳部:《關於封鎖五家媒體的通告》,載《緬甸新光報》2021年3月9日,第32版, https://www.burmalibrary.org/sites/burmalibrary.org/files/obl/ma1_9.3.21.pdf。

“避免以对个别国家产生战略依赖的方式发展经济”。^[1]

刚强又敏感的民族性格又使缅甸从“中立”走向“孤立”。辉煌的历史使缅甸民众普遍以为缅甸是中南半岛举足轻重的国家，理应受到世界尊重。然而，独立以来缅甸经济落后、内乱不断，政权合法性一直饱受外界质疑。外界的批评和制裁令缅甸民族感到不安和抵触，其敏感的内心逐渐膨胀。这种情绪加剧了他们对国际局势的不安全感，始终处于一种“随时准备应对攻击”的状态。^[2]在“刚强”性格的驱动下，缅甸精英倾向于认为“孤立”才是维护国家独立和自主性的最佳途径。该思想导致缅甸经常采取主动减少与国际社会交流与合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孤立主义”倾向。诚如吴丹敏指出的，“缅甸精英的本能是刚强、绝不示弱，但他们是有可能被改变的，甚至缅甸精英自身也想改变，但绝不能让他们觉得是受到施压逼迫而改变，否则将适得其反”。^[3]

结 语

缅甸民族性格总体上呈现出“温和乐善”“刚强尚武”“敏感谨慎”的三重特质。缅甸民族性格深刻地影响着缅甸内政外交，左右着当代缅甸问题的走向。缅甸民族外柔内刚的性格特点投射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中，导致其不断面临着外“联邦制”而内“单一制”的矛盾和冲突。缅甸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引入、借鉴西方政治选举程序，另一方面又试图保留中央集权内核，导致“缅式民主”屡屡出现反复，至今仍在苦苦探索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在民族整合层面，对分裂的担忧导致缅甸中央政府始终难以完全接受联邦制的分权模式。对族群关系的过度安全化处理，逐渐演变成

[1] 参见 Michael J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15.

[2] David I.Steinberg, *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2010, p.62.

[3] Thant Myint-U, *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W.W Norton & Company, February 23, 2021, p.52.

一种难以打破的僵局。外交上，在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下，处于“十字路口”和“中间地带”的缅甸始终是大国竞相关注的对象。在温和性格影响下，可以预见缅甸将继续秉持“中立主义”，努力与各国发展良好关系，但其性格中“刚强”的一面也很容易使其在外交中表现出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缅甸民族性格中的敏感与谨慎特质，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倾向于采取审慎的立场。因此，在三重性格的影响下，缅甸的精英阶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往往展现出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他们坚持“中立主义”的传统立场，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不偏向任何一方，体现了缅甸独特的外交策略和处世哲学。此外，民族性格虽极具稳定性，但仍需看到其并非一成不变，不能因民族性格而断言某个民族将永远处于顺境或逆境。^[1] 在一个民族的多重性格中，不同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一面亦会发生转变，以适应新的变化。

对中国而言，深入了解缅甸民族性格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从民族心理层面深入了解当代缅甸问题的复杂性，把握好中缅关系的各种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好复杂敏感问题，以更大的耐心支持缅甸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深化中缅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坚定弘扬中缅“胞波”情谊，巩固两国人民友好感情，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收稿日期：2024-08-30】

【修回日期：2024-10-18】

（责任编辑：马燕冰）

[1] Ernest Barker,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Factors in Its Formation*, Morrison & Gibb Ltd, 1927, p.8.